

第一章 二次东渡 弃商从军

陈仪幼时喜读《史记》，好论前人功过。他目睹国势岌岌，思以马上治天下，乃弃商求学，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归国后，曾任陆军部二等课员。1917年又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从此奠定在军界的地位。1924年，孙传芳入浙，陈任第一师师长，随后接替夏超第一次主浙。北伐军兴，所向披靡，陈仪遣人与蒋介石联系，暗受国民革命军番号。孙传芳得密报，陈仪险做刀下之鬼。

1928年，陈仪远游欧洲归来，出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军政部次长。海外之行，使他对中国的前途、国家的建设作了种种设想……

东渡习武 弃商从军

陈文瑛口述

先父陈仪，曾名陈毅，字公侠，又改公洽，自号“退素”。1883年5月3日（清光绪九年，癸未三月二十七日）生于浙江绍兴。祖父炳镛，字静斋，祖母王氏夫人。

陈仪的早期经历，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一）1883—1902年，青少年时期。（二）1902—1917年，第一次求学日本及辛亥革命时期（三）1917—1923年，第二次赴日本及寓居上海时期。（四）1923—1927年，浙江时期。

陈仪幼年好学，涉足经史典籍，孜孜不倦，特别爱读《史记》，好论前人的得失成败。祖父陈静斋经常出外经商。叔祖父陈荪阶是前清秀才，赴杭州蒋广昌教学，大伯父陈威和陈仪随行，与蒋抑卮先生同从叔祖父学。当时，祖母希望先父学商，故后将陈仪召回，进绍兴怡丰钱庄当学徒，业师为高尚德（字伯俊）。陈仪学师期满，得到祖母同意，再次赴杭求学，入杭州求是学堂，该校系浙江大学前身。

1902年，陈仪考上官费与同乡邵明之（后改铭之）等结伴东渡日本。这是陈仪第一次去日本，到日本后人成城中学，为后日人士官学校作准备。当年成城中学毕业的中国学生因故不能直接入人士官学校，陈仪乘此空隙进了陆军测量学校学习。一年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炮兵射击学校第四期。1904年鲁迅、许寿裳、邵明之和陈仪曾在日本东京合影留念。当时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倡导革命，陈仪是光复会会员，且与徐锡麟、秋瑾、蔡元培、蒋尊簋、蒋方震、蔡锷等结识甚早，爱国革命之志早有萌发。

1907年毕业回国，在陆军部任二等课员。（后来陈仪常说：“凡事不可能一步登天，我就是从二等课员做起的。”）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浙江也随之而起，蒋尊簋（字百器）为浙江第三任都督。蒋尊簋，诸暨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同盟会会员。当时他在浙江颇孚人望，由其领导革命，为各界人士所尊敬。蒋尊簋邀陈仪为助手，委陈仪为都督府军政司司长，负责后勤后备等事宜。由于陈仪工作认真负责，人多

信赖。

其时，朱瑞率领浙江支队支援江浙联军攻打南京，在克复南京后，南京临时政府委朱瑞为陆军第六师师长。1912年朱瑞班师回浙，他恃功而骄，有夺权之心，但对蒋尊簋则不敢当面攻击，他们密谋策划，先把陈仪迫走，以孤立蒋。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朱瑞指使其部下首先发难攻击陈仪后备供应不力。陈仪一怒之下，即弃职而去，不久蒋尊簋也辞职，朱瑞便取得了都督地位。

1914年军政府改组，陈仪应召去北京任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参议。1916年袁世凯窃国，改号“洪宪”，蔡锷（松坡）以计离京去滇反袁。袁派陈仪赴津追蔡回京，陈仪到津与章宗祥、蒋百里（名方震）商量，决定以“追不到”回报。不久陈仪也离职。

1917年，陈仪第二次到日本，入陆军大学，为中国留日陆军第一期学生。先母沈蕙和我随行，当时我6岁。

1920年，陈仪回国后，全家定居上海。先住在哈同路（现铜仁路）民厚里，不久搬到辛家花园。后又搬到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联珠里和傅壮民医生同住，我们住西半部分，傅医生将其余一半除住家眷外，并设立了一小医院。两年后，傅医生的医务逐渐发展，陈仪也嫌人多繁杂，我们全家搬到隔壁一所三楼的独家住宅内，一直住到1924年。

在此期间，陈仪在上海经营实业，与友人合资兴办裕华垦殖公司，地址在江苏东台。同时经商，接办丝绸商业银行和钱庄。当时经常往来有钱新之、李馥生（后任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蒋抑卮（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蒋孟平等。

1922年，陈仪曾去日本，当时他任裕华垦殖公司经理。张謇其时亦在苏北办实业（盐垦），因自然灾害及市场情况变化，经营发生困难，必须另筹巨额资金，遂通过陈仪筹划向日本借

款。陈仪此次去日本，就是为了这件事。1922年9月20日自日本归国。在这次去日本时，陈仪娶了日本女子古月好子，回国后改名陈月芳。

1923年到1924年之间，江苏军阀齐燮元与浙江军阀卢永祥为争夺上海而发生战事。福建方面的孙传芳乘虚入浙。浙江原有第一师（即第六师改称）和第三师（即独立四十九旅扩充而成）师长潘国纲、张载阳，因卢永祥失败而出走。

浙江地方人士怕受战火殃及，派代表赴孙传芳军表示欢迎，陈仪为代表之一。

1924年孙传芳入浙江，任陈仪为浙江第一师师长，周凤岐为第三师师长。其时一师内部复杂，陈仪怕不能胜任，辞不获已，才去宁波接事。随后师部迁回杭州，驻梅东高桥。师参谋长葛敬恩（字湛侯，嘉兴人，日本陆大毕业）；参谋项雄霄（嘉定人，南洋陆师毕业）；一旅旅长石铎（字宗素，温州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二旅旅长余宪文（陆大毕业）。陈仪接任后，锐意整顿，将军官轮流受训，自己亲自讲课，并深入部队，一年后军容有所改观。

1925年，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假秋操之名，出动五路军队，进袭沪宁津浦一带的奉军。陈仪率领一师沿津浦路北上，经过固镇和宿县两次战斗，把张宗昌部队打垮。11月占徐州。孙传芳任命陈仪为徐州总司令。不久我们全家从杭州迁到徐州，住在司令部后面的家眷住宅楼内。

陈仪在徐州搞了一些建设，如修筑徐州所属八县的公路，架设电话，钻井取水供市民饮用，安定社会秩序等等。

1926年，夏超在杭州宣告独立，响应国民革命，被孙传芳部下宋梅村杀害。孙传芳随即命令陈仪回浙江任浙江省省长。这是陈仪第一次主政浙江。因为他本是浙江人，固心情十分兴奋，

很想为乡里桑梓办一些好事。可是不到三个月，有一天，父亲突然要我们离开杭州去上海，而他却搬到省府居住。我们走后不久，孙传芳派兵包围了梅花碑省政府，并将陈仪执送南京扣押在联军总部，幸而当时蒋方震先生在联军总部为顾问，他与陈仪交谊颇深，得蒋之营救，陈仪方得释放回到上海。

陈仪获释时，一师与孙传芳军隔江对峙，陈仪曾两次写信恳劝孙传芳顺应革命潮流，响应北伐，然孙终不接受。

陈仪回到上海后，有人劝他收拾旧部，重整旗鼓，他说自己不识诈虞，连累一师也遭受挫折，深感惭愧，所以不愿再干了。

1926年至1927年前，陈仪曾被任江北宣抚使，然未就职。

（项斯文整理）

军阀征战 向蒋输诚

葛敬恩口述

1926年秋，陈仪是孙传芳所委派的徐州总司令，我担任参谋长。在两年前，孙攻占浙江，将潘国纲统率的浙军第一师收编，潘离开了军队。这支军队在浙江有悠久的历史，官兵们自成系统，虽被收编，却非外籍军官所能轻易控制。孙传芳了解到这一点，于是想利用陈仪，到上海邀陈出来充当第一师师长。孙、陈原系日本士官先后同学，但无交情。陈与第一师历史关系也很浅。1912年，陈在浙江都督府担任过军政司长，后来因为本省不同派系的军人互相倾轧，他被保定陆军速成出身的吕公望等一派所排挤辞职而去。陈仪与浙江地方军队说不上有感情，这是孙传芳注意到了的一点；但陈毕竟是浙江人，在军界资历深，这又正适合了孙的要求。孙在政治上的做法之一是勾结地方势力相互利用，为他摆场面，巩固地盘。这时为了控制浙军第一师而找到

陈仪。陈由于自己和第一师交情浅，知道我在这一师服务很久，和官兵们相熟，便找我去当他的参谋长。我和他是留日陆军大学的老同学，彼此向来关切，在这一时期，我俩共事颇为亲密，他对我也是言听计从。

自从陈仪接受了第一师师长后，第一师在津浦路上屡立战功，尤其在攻击张宗昌白俄铁甲车以及“任桥之役”中，第一师的炮队都显示了威力。陈被擢升五省联军的徐州总司令。

当北伐军长驱进入湘赣的消息传来，陈和我曾在一起谈论当时形势。我觉得南军这次北伐声势浩大，我们应该设法去了解北伐军的实况，及时早作安排；当时还未作脱离孙传芳的打算。陈考虑到他向与蒋介石无缘，也没有可信任的朋友具备担此任务的条件。我因辛亥年杭州光复之夕与蒋介石见过面（蒋那时任敢死队队长）；黄埔军校开办之初，蒋着吴思豫到浙延聘教官，曾托吴向我致意并邀我前去（吴思豫和蒋是留日振武学校同学，吴与我是幼年同学），我就向陈说明情况，自告奋勇，愿去江西一行。经过进一步细商，觉得若不先得孙传芳的默契，便如此去做，可能闯出岔子；不如先以电报向孙提出建议，公开说明需要了解北伐军内情以便必要的应付，请他指示。我们估计孙此时态度骑墙，对南蒋北吴（佩孚）尚未分明敌友，正在观望风色，企图投机取巧，因此这一建议可能适合孙的意图。果然电报到了南京，正中孙的下怀，他立即复电，认为可以一试，且询问谁堪担任去赣代表。陈复电提议派我前往，孙回电同意，并嘱我先到南京见他，然后去汉转赣。我带了徐培根立即南行，到南京时，江西形势突然吃紧，孙已匆匆去九江。我乃转轮船沿江而上，到了九江，在“江新”轮上见到了孙传芳。此时，孙正策划避开与北伐军接触，要求北伐军不打江西，移师沿京汉路北上，让北伐军与吴佩孚部决战，自己俟机由赣西截击武汉，坐收渔人之利。我

在船上还见到了蒋百里；看到日本人冈村宁次也在船上，冈村是孙的军事顾问。冈村宁次坚决主张对北伐军作战，并在孙面前竭力反对我去汉口。蒋百里说可能孙的和战方针日内会突然决定。我听了他的话，却踌躇起来。蒋百里是主张联南的，因孙左右多是北方军人，主战的占多数，自己是南方人，疏不间亲，在船上发表主张不便。但他仍催我去汉口，说在九江总部方面当为我尽力安排。我便到了汉口。当时，浙闽各团体和平代表张一麟、蒋尊簋、魏伯桢、史家麟等到汉呼吁和平。我表面上是孙传芳的秘密代表，实际是陈仪和浙军第一师的代表。

我在汉口见到了唐生智、陈铭枢、邓演达以及刘文岛夫妇等人。他们答应代我向蒋介石联系，但不让我通过前线去见蒋，说是武昌未下，路上难以通行。我和江浙各团体代表都被留在汉口好多天。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是托词阻挡。不久武昌破城，我们才绕了大圈子，中经长沙、株洲、萍乡、分宜、高安等处，到奉新去见蒋。我在汉口与北伐军接洽时，以五省联军的力量作为谈和的基础，说如果两军交战，北伐军未必可操胜券，而孙的军力尽够应付。

我与魏伯桢同行到奉新，住在张勋的祠堂里。当时蒋介石住在奉新天主堂内。我和蒋介石谈了三天，谈到当前的军事形势，主要是讨论大局的发展。以前，我对蒋印象不是很好，一则我把他看作是当时所谓嵇县帮^①有关的人；二则因为他在民国初年生活腐化，觉得他不宜为友。这番见面，颇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之感。他殷殷希望我参加北伐工作，不必再回徐州，我未应允。我转达了陈仪的殷切愿望，希望能早日结束无谓的混战。关于孙传芳，我对蒋说：“他不一定要和北伐军为敌，至于以后他

^① 嵇县帮是嵇县坏分子所结合的一派，蒋本人虽非嵇县人，但蒋母王氏是嵇县人。

如态度明朗，则不分南北彼此合作，否则到时尽可收拾他，这也并非难事。”蒋始终凝神听着，口中不时发出“嗯”的声音。我在措词中一方面表示陈仪有接近北伐军的意思，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仍是代表五省联军。蒋没有明确答复，但希望与陈仪合作是肯定的。

在我离开奉新之前，他一再同我商量把委任陈仪为十九军军长的委任状交我带回。在汉口时，我已知周凤岐接受了第二十六军军长的委任。拒绝接受委任恐不太合适，当时，我与陈仪的交情尽能替他作一半主，所以便替他收了下來。临走时，蒋又给我一封转交陈仪的亲笔信，写了十多张纸，每个字有核桃般大，他还亲自送了我们一程。

我由江西回来时，闻孙传芳的军队已经被北伐军击败，正狼狽地溃退。从汉口乘江轮路过九江，目睹散兵挟着木板等物泅水渡江逃命，浮尸蔽江而下。此时浙省由于夏超之变，改换局面。孙传芳因浙江省议会及浙江省各团体曾要求浙军回浙，顺水推舟把陈仪调去当浙江省省长，第一师随同回浙。当初孙对陈表面说得堂皇而且诚恳，许陈放手贯彻“浙人治浙”方针；但实际他在玩弄手段，一方面分化浙江地方军队，一方面达到缓兵目的，使北伐军不致遽入浙江。陈回杭就职之后，铁路线上孙的嫡系部队在暗中布置。我回来时随身携有蒋介石的亲笔信和委任陈仪为第十九军军长的委令，一路担心，过南京时，惴惴不安，未敢登岸，一直随轮船到上海，就转往杭州。陈仪接受了委任状，但未敢明白表示依附，仍旧以浙江省省长面目露脸。经过一时的酝酿，浙江各界联合会发出了浙省自治的通电，陈为了不与孙冲突，将所部第一师中的大部分调往宁波绍兴一带分散驻扎。两三天后，孙部孟昭月旅出人意料，突然潜入杭州，立将留杭的第一师部队分别包围缴械。陈命令不予抵抗，省长公署卫队亦被解除

武装。陈在署闻警，匆匆找我商量，要我从速离杭，设法集合被缴械遣散人众，并联结一师各部保持组织。我由省府后门走出，从海道到上海。此时我的想法是：（一）援救在浙省府被包围之陈仪；（二）保全浙军第一师建制，妥当安排。

我到上海找到了张群，他代表蒋在上海做联系工作，实际他也是赤手空拳，出卖风云雷雨。他联系的对象只是海军的杨树庄和一些政治派系，调动不了实力。我因私人关系便与黄郭商量^①。谁知这一两天浙江的情况又起了新变化，陈仪已由孟昭月（或上官云相）派人护送去南京看管，放弃了浙江省长一职。而第一师由于拉成一条长线来不及集结，不久被由福建开来的周荫人部截击分成数段，只徐培根所部在奉化抵抗了一阵，一部分投奔了浙军第三师周凤岐。

因为局势有新变化，蒋由南昌屡有电报来，要我去南昌；黄郭并力劝我就此参加革命阵线。这一阶段我去过南昌、庐山好几趟，黄郭夫妇亦相陪。蒋要我担任总部参谋处长工作，因为这时总参谋长白崇禧出任东路前敌总指挥由赣进浙，参谋处长张定璠也被调遣出去，蒋面前没有适当的人，所以把我填了空。

（李子宽记）

初任省长 接受改编

蒋授谦口述

1924年，福建之孙传芳，乘卢永祥与齐燮元在黄渡一带酣战，后防空虚，率部由闽北袭取浙江。驻防仙霞岭的浙江守军炮兵队队长张国威，与孙传芳同学，没有什么抵抗，就放弃阵地，

我和黄郭原是浙江武备学堂同学，又是亲戚，一向交谊甚厚。

并拉拢浙江之日本士官同学出来工作，巩固自己地盘，博取浙江民心。如聘蒋方震（百里，海宁人）为总参议，任陈仪为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浙江陆军原有第一、第二两师，建制已久，孙传芳到浙后，把自己的嫡系陆军第二师编入，师长卢香亭，保持它的传统番号，而改浙江陆军第二师为第三师，师长周凤岐。

陈仪接受了孙传芳任命，于9月间到宁波防地就职。以葛敬恩为参谋长（湛侯，嘉兴人），项云舫（雄霄，嘉定人）为中校参谋，徐培根为少校参谋，石铎（宗素，温州人）为第一旅旅长，余宪文（乐清人）为第二旅旅长。

陈仪在宁波就职以后不久，第一师司令部即开回杭州，驻梅东高桥。陈治事甚勤，公私生活，非常刻板。黎明，轮流到各团、营训练地点看士兵操练，官兵振奋，富有朝气。

1925年秋间，孙传芳不甘于局处浙江一隅，觊觎淞沪地盘，借“秋操”之名，令第一师出动袭击奉系军阀杨宇霆部。陈仪得到通知，以葛敬恩留守，自己率领两个团（记得是第二、三两团），炮兵、工兵各一营，骑兵一连，经沪宁路渡江沿津浦线前进，和卢香亭师并肩作战。夹沟、固镇之役，击退张宗昌军，进入徐州。孙传芳以陈仪兼任徐州总司令，并将所属第二十四混成旅李俊义部也归陈仪指挥。

陈仪任徐州总司令，仍以葛敬恩为参谋长，以项云舫为参谋处长，徐培根为中校参谋。徐恃才使气，忌之者说他自负太甚，为此，陈约徐长时间谈话，徐心服，其后积极工作，仍为陈倚重。

陈仪在徐州的时候，举钱宗泽（慕霖）为徐州警察厅厅长。钱是一师旧人，为浙系保定军校出身的最早一辈，因陈仪出发时，钱到车站相送，临时为陈邀去帮助。章世嘉（筱斋，绍兴人）为铜山县长，章为童保暄任第一师师长时的副官。在一年多

的时间内，由于部队还能重视纪律，军民之间，情感融洽，地方人士，誉为军兴以来难得看到的部队。后来第一师开回时，徐州人士热烈地欢送。

第一师驻扎徐州的时候，对地方建设，帮助也不少。如由徐州通向萧县等地的公路，利用一师军工修筑；在城区也有军工修筑了一条很长的环城马路。在著名的九里山建筑了一座可以容纳一个师的营房。同时还在营房面前开凿洋井。由于地势较高，钻探到几十公尺以下的深度才发现水源，解决了附近一带居民和兵营所需的饮水。施工人员时常对人说，挖掘这口洋井，工程比造营房艰巨。

1926年3月间，创设“浙江陆军第一师干部教导队”，队长由中校参谋徐培根兼任。我也由参谋处书记兼任教导队书记。学员则由全师班长和上士中考试及格后入队受训，修业期间一年，分两学期，结业后分发各团营见习，以军官任用。第一期学员约百人，期终测验，部分学员不能进入第二期，因此结业时分发的仅70余人。当时课程，超过五省联军军官学校。秋间，孙传芳来徐州检阅教导队时，表示嘉慰，奖金特优。后来学员分发时，改名为“徐州干部学校”。

1926年秋，夏超接受国民革命军十八军军长，在浙江宣布独立，截断孙传芳的后路。第一师在徐州的高级军官在一个集会上（孙传芳经常轮流召见各部队的高级军官到五省联军总司令部谈话）听到孙军的李宝璋谈说：“我（李自称）只要用一团兵力，就可以击破夏超。”朱锡麒（中校参谋，后升第一团团团长）和徐培根（中校参谋后升第四团团团长）说：“夏超现在的实力，不能轻视他了。”及至夏超失败，感到有些突然，出乎意料之外。

孙传芳收复浙江后，缩短防区，任陈仪为浙江省长，仍兼第一师师长。陈先回浙任事，第一师也陆续撤回浙江。第二团和骑

兵营驻防杭州，其余各部队开赴浙东，第四团和教导队驻福建五夫（教导队长始终由徐培根兼任，徐升任第四团团长，教导队就跟着四团行动）

1926年，陈仪在徐州时，国民革命军北伐，已向武汉推进，参谋长葛敬恩向陈仪建议，陈又向孙建议，并得蒋百里的协助，派葛去武汉，想迎头找国民革命军与之协议，主张各沿津浦和平汉铁路分头并进北伐。其后武昌既下，葛就由湘入赣，在奉新县与蒋介石见面，秘密带回“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的番号。陈正考虑怎样向孙传芳建议，怎样来和国民革命军合作之时，夏超失败，陈即匆匆来浙继任。当时军政各方面接触频繁，局势混乱。其时第三师的周凤岐，已由九江退回浙江，已经接受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的委任，四处放出空气，准备行动，外间已是满城风雨。这时驻防杭州附近的孙军孟昭月、王森部，他们从夏超独立以后，与浙军有隙，听到浙军不稳的风声（自然也是接到孙传芳的指示的），就径自开入杭州，包围浙江省政府，缴第一师驻杭部队的枪。陈恐糜烂地方，没有令部队抵抗。但官兵缴械后，愤怒不平，冒着危险渡江向绍兴集中，准备起义。陈本身初被扣押在梅花碑省长公署，大约经过两昼夜，由孟昭月派员解赴南京五省联军总司令部软禁。

第一师在绍兴与孙传芳军隔江而守，听到师长被软禁于南京，就酝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十九军，准备作战，对被缴械的二团，重行整编，补充兵器。但因内部人事还待调整，没有正式公布番号。

陈仪被禁在南京联军总部时，孙传芳在鸦片烟榻上见了他说：“你暂时在我这里休息一下！”孙的参谋长刘宗纪、秘书长陈闻（季侃）和陈有私交，向孙报告军事形势的时候，谈及第一师在绍兴的行动，认为第一师官兵对陈印象很好，可以责陈出来

安抚，清除敌意，勿使加入国民革命军。陈因此得释。到达上海后，立即陈述自己对国民革命军的看法，以局势利害，劝孙当机立断，不再与国民革命军为敌，并缮成一信，派弁目李锦文去南京报送。等待约一星期，没有复音，再派陈卓霖去南京催询前函情况。孙收到陈仪的两次来信后，没有作出决定，仅由副官处出了一张收据和给送信人 10 块钱的旅费。陈见孙没有表示，就留在上海。这大约是 12 月中旬之间的事。

第一师官兵在绍兴听到师长脱险的消息，军心振奋，准备行动起来。教导队提前约一个月结业，分发原来的团队见习。我也回到参谋处工作。参谋长施伯衡（缙云人）看到我们回去，慰劳一番，不久，林蔚（蔚文，台州人，系葛去武汉后向陈仪推荐）、陈铭阁（守谦，河南人）渡江来绍，经过会议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十九军，遥奉陈仪为军长，在陈不能到职以前，由第一师师长石铎代理。军之下编为两师，以原来第一旅及所属第一、第二两团为第一师；第二旅及所属第三、第四两团为第二师。一师师长兼代军长，二师师长兼任前敌总指挥，保持均势。炮兵团长林显扬（达深，黄岩人）很想扩编成旅，但因兵员武器无法补充，也只得与骑兵、工兵、辎重各营一样，归军部直辖。1927 年元旦，在绍兴大校场公布成立时，还增设了一个政治部，政治部的主任是杜伟（时霞，青田人）。

十九军成立以后，不能偏守绍兴一隅，即开展军事行动。经过高级将领的商议，决定向宁波、宁海迎击周荫人军，认为周荫人军由福建行军入浙，长途奔驰，疲乏不堪，地方舆情，不会对周军有利，可以一举而击破之。主张最力的是第一团的朱锡麒与第四团的徐培根。他们俱有野心，想打垮周荫人部，吸收他的散兵，扩充自己的实力。他们对师长只是表面上的尊重，骨子里有自己的一套打算。当时发布命令，施伯衡对我说：“蒋书记，徐

培根的命令，慢一点发，他动作快，怕配合不上。”

决定向宁海进军，攻击周荫人部。第一团和四团先行开赴百官，司令部所属各处继续开动（改编后的军司令部和一师司令部没有什么区别，仅名义上多了一块牌子），深夜从水道起行（约1月上旬的头几天）开到西坞，停留半日，午餐后再开方门，约在午后4时到达。次日下午，看到第一团长朱锡麒右臂包扎纱布负伤下来，在我的铺上休息，说部队不听命，要我拟电报报告上海陈仪；又问我徐培根消息怎样，下来没有？我以不知对。傍晚，他离开军部。这时前方败兵，向方门而来，势如潮涌。军部派炮兵营长姚永安率领卫兵坐守门前，指示他们向指定地点集中，他们也没有进入司令部。入夜，前线已被周军击破，大势已去，军部人员陆续出走。我向施参谋长询问行止，他说：“你看大家往哪里走，你就跟他们走。”我说：“文件、地图呢？”他说：“快烧。”我完成这个任务后，和蒋汉槎（参谋）、陈建子（见习）等离开方门，向石浦方向前进，想到那里乘轮船至上海。沿途不少退下来的人，谈失败经过，说主要是学派之争，讲武堂与保定军官派的斗争很激烈，讲武堂出身的张乐等人，不听保定出身的特别是朱锡麒和徐培根等人的指挥。其次，一师士兵过去出省作战，倒还很勇敢，可是这次在省内作战不肯卖力。第三团在新昌遭遇敌军，新昌、嵊县籍的士兵，见家乡在望，无心作战，秘密把枪埋了，翻山过岭地跑回老家去了。他们地形熟悉，记住埋枪地点，准备事平之后重来挖掘。所以部队没有支持几天就溃散了。但也有自动集结，保持一部分实力的。

我们到达上海，见到了师长，才知道徐培根在宁海失败后，只身来到上海，写了一个“十九军在宁海作战失利”的报告，径自往江西投入国民革命军行列。

陈仪在上海得到第一师被击溃的消息以后，要林显扬去台

州；季遇春去温州，分头收容。他们因为陈平时相信朱锡麒、徐培根，受到排挤而隐恨未消，迟迟其行。又值农历年关，忙于私人事业，遂失去时机。

林显扬和季遇春虽没有及时收容一师散兵，但一师散兵部分在宁波天王寺集合。工兵营长奚骏声收容了不少，他和余宪文收容的散兵在杭州集训，东路军何应钦看到一师余部不足一军，便改为一个师的编制。在酝酿改编中，朱锡麒等邀陈仪来杭州加强活动，因沪杭路中断，陈仪由宁波海道而来。到达不久，余宪文通电就十五师师长职，陈就由原路返上海。至是从辛亥建制起来的浙江陆军第一师，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一师官佐不受十五师改编的，由陈函送东路军总司令部任用。

第一师的瓦解，除上述内部纠纷外，第一师旅长余宪文、石铎的明争暗斗，不择手段地争夺权位，还有一个郑佐平也想插上一手，以致弄得内部很混乱。同时，何应钦最忌浙人得势，从中破坏。当时蒋介石曾一再叫葛敬恩任第一师师长，将它整顿恢复起来。葛因内部矛盾很多，外有何应钦作梗，故葛推辞不干，最后就编为十五师。

被扣南京 险遭不测

杜伟口述

辛亥革命时期，蒋尊簋任浙江都督时，陈仪是浙江军政司司长。后来朱瑞代蒋为都督，他与蒋尊簋共进退，同时离职。蒋、陈之间，私交不恶。此后将近十年之间，他始在北洋政府有过一段宦海升沉的经历，后在沪开办一家丝绸银行，经营不善赔本蚀光，乃束装东渡，进日本陆大深造（陈仪早年先后毕业于日本士官和炮兵学校），学成返国，回浙再任军职。

1924年秋，孙传芳入浙，夏超等人以陈仪与孙有同学之谊，促驾到桐庐迎接孙传芳，两人相偕抵抗。孙向陈询问蒋方震的近况，经陈之推毂，蒋来杭与孙会晤，孙即以潘国纲所遗第一师师长职畀蒋，蒋固辞，转荐陈仪为师长。陈仪自此开始带兵，在宁波接收潘国纲旧部，部队番号仍旧。我当时任宁波警察局局长，军警接触频繁，彼此由是订交。后来我入北京陆军大学，他给我挂上一名师部附员，按月支薪，津贴学费。1925年秋操，孙军势力扩及苏北，陈仪虽非孙的嫡系，但相当被器重，论功行赏，调陈率所部驻徐州，膺防守司令名义，声势不小。

1926年大革命前后，我从北京南下，至徐州见陈仪，谈起北方军政混乱局面，其时正值张作霖入京，冯玉祥出走，有人说张像“李闯王”。陈对我说：“北方军阀当权，政出多门，统一中原是不可能的。我已劝馨远（孙传芳字）与南方合作，前几天派葛敬恩去汉口，你可代我去山东、河南进行联络，暗中观察动静如何。”我说：“张宗昌是胡匪出身，樊老二（钟秀）也是豫匪，我们很难同他们交往。”陈就委我去汉口帮助葛敬恩进行活动。我抵汉晤葛敬恩后，葛告我已接蒋介石来电，准备到江西奉新与蒋会晤。这时武昌还在北军手中，葛嘱我在汉口与邓演达、陈铭枢、唐生智等三方面联络。迨武昌守将刘玉春向北伐军投降，我又衔邓演达命密赴九江策动周凤岐师反正。我完成策反任务后，又到上海协助钮永建策动夏超独立。不料夏超起义后，其十八军在嘉兴作战，失败之速，几乎出人意料，多年经营的保安总队，经不起宋梅村旅一击，即溃不成军。夏超独立失败后，孙传芳调陈仪继任浙江省省长，仍兼第一师师长。陈于1926年10月率所部回浙履新，留第二团与骑兵营驻杭州，其余各团分驻绍兴至五夫一带，是为陈仪之第一次主浙，也是适逢其会。正当此时，孙传芳抵抗北伐之师，在南浔铁路线上（涂家埠至九江）被革命军

击溃，全部向苏浙边境败退，孙亦逃离九江，退居南京老巢。先是，陈在徐州时，已与北伐军互通声气，暗中早经接受国民革命军给予的第十九军番号，准备乘机观变，易帜响应。但因新接浙江省政，某些行政上的措施，尚未布置停当，想跟孙传芳面谈，敦促与南方合作，一时也没有机会。而浙江革命的空气，却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此时在九江的周凤岐师，已暗中接受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番号，班师回浙，社会哄传，谣言繁兴，都说陈、周两人态度不稳。驻在临平笕桥一带的孟昭月、王森部队，认为浙军不尽可靠，自恃为“大帅”（他们尊孙传芳为“大帅”）嫡系，效忠到底，竟不向“大帅”请示，擅自率部开入省垣，勒缴第一师驻杭的季遇春团（二团）及骑兵团（卫队营）的械。当时官兵义愤填膺，向陈请示，要求抵抗，陈以众寡悬殊，后援不继，如果发生巷战，难免地方糜烂，因令季遇春团和骑兵团官兵缴械。官兵于缴械后，冒着孙军截击的危险，自动渡江，向绍兴、五夫一带集中，待命改编，加入国民革命军行列。

陈本人在所部被缴械后，即被孟昭月看管在梅花碑省长公署。3日夜，旋又被押送南京，软禁在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总司令部。时为1927年的年头岁尾。陈仪这次出任省长，从接印到待罪，首尾不足3个月。

陈仪蒙难不久，驻在绍兴、五夫的第一师主力和两个旅长（第一旅旅长石铎、第二旅旅长余宪文）就干脆打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番号，于1927年1月在绍兴大校场宣布易帜，遥奉陈仪为军长。第一旅旅长石铎为第十九军第一师师长兼代军长职务，第二旅旅长余宪文为第二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杜伟为政治部主任，开始向宁波西坞方面行动，准备迎击孙军周荫人的部队。大敌当前，理应团结一致，无如事实上的表现，却是群龙无首，内部派系之争，甚于敌人。如第四团团长徐培根、第一团团